

我们的周总理

戴平



1952年夏,周恩来邀集在北京的亲成为六伯父周嵩尧过80大寿,并亲自下厨做了两道六伯父喜欢吃的家乡菜。

我自1950年初调到外交部工作以来,多半时间是在礼宾司度过的,曾亲耳聆听周总理的教诲,目睹周总理的为人。

他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1965年夏,非洲某国元首来我国访问。北京访问结束后,周总理又赶到上海同在那里访问的客人继续会谈。客人圆满结束对华访问离开上海回国时,按惯例,机场安排了3000多群众欢送。正当周总理和上海市领导同志陪同贵宾步入机场,在欢送队伍前绕场一周时,突然乌云盖日,雷声隆隆,狂风大作。欢送仪式尚未结束,雨点已落了下来。客人登机后,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淋透了机场上每一个人。雷雨交加,总统专机不能马上滑向跑道。周总理纹丝不动地站在机前,执著地尽主人送客的礼仪。整个欢送队伍看着周总理,也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隐隐可见机舱内客人在挥手示意,请周总理进候机楼。警卫同志为周总理打起雨伞,被周总理拒绝了。大家都担心周总理的健康。大概认为是礼宾官员上前比较合适,他们让我再

次给周总理送伞。我提起伞走到周总理跟前,恳求地说:“总理,挡挡雨吧!”周总理转过头看了我一眼,严肃又慈祥地说:“群众不也在淋雨吗?我怎能忍心自己打伞呢?”听了周总理的话,我心里一阵热乎乎的。

按原定计划,送走外宾后,周总理留在上海处理公务,我们工作人员在客人起飞后乘机返京。这时,看着被雨水浸透的我们,周总理当场指示,要我们先回宾馆。回到锦江饭店,服务员为我们送来了热腾腾的姜汤,并说:“这是周总理嘱咐为你们准备的。喝完姜汤赶快把湿衣服换下来,我们好送去浆洗。”顿时,同志们的眼睛都湿润了。周总理啊,周总理!大雨淋透了您全身,您无动于衷,却为工作人员作出了周到细致的安排。您心里装着他人,唯独没有您自己。

他总是为外宾想得很周到

1965年8月下旬,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比塔塔访华,在离京赴外地访问的当天上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送走客人后,周总理对我说,礼宾司总是喜欢安排大项目给外宾看。当然喽,大项目不是不能给外宾看,而是要看来访客人的具体情况。尼泊尔多山多水,是内陆国家,交通运输存在一定困难,当前以发展小型水力发电站较为有利,也较合算。你们今后要注意。周总理一席话一针见血点出了我们工作的不足。当时我们考虑到尼泊尔水力资源丰富,有待开发,安排了客人参观水电站,但却是大型的新安江水电站。回到钓鱼台国宾馆,我马上给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挂长途电话,将周总理对礼宾司的批评和指示告诉他们,并请其报告省领导同志,研究补救办法。浙江同志雷厉风行,在下午代表团抵达杭州时,已调整了日程,增加了安排客人参观双龙洞小型水电站。这个小水电站共有四级,规模不大,

投资不多,工程设备也不复杂,却解决了山上山下大片居民的用电。外宾从山顶沿弯弯曲曲的山涧小道,逐级参观,下到平地,参观也就结束了。他们边看边感叹地说,修建这样的水电站,我们的国家发展就会快得多了。很明显,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双龙洞水电站,而不是新安江水电站。

又如,1966年4、5月间,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来我国访问。在筹备这次接待时,周总理针对阿尔巴尼亚地形形势和粮食不足的情况,指示礼宾司一定要安排他们参观一个生产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好是在自然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农副业生产有较好收成,人民生活较前有明显改善的。对此,北京市外办给予了大力协助,他们分路察看了好几个生产队,礼宾司同志也一起去了房山县等地。各队都各有特点,但都不完全符合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后来,中央农办领导同志推荐了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生产队。我把调查情况和中央农办的建议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稍加考虑,即指示由王炳南副部长带公安部队一位副团长及我前往沙石峪,并指示空军司令部派一架歼七飞机和一架直升机送我们前往。第二天我们到了沙石峪。王炳南副部长作了非常仔细的调查和实地考察,认为基本符合要求。傍晚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后露出了笑容,打趣地说:“你们是不是说得好了些?”大家不由得笑了。

周总理亲自陪同谢胡主席参观沙石峪,回程还参观了王国藩大队展览馆。参观中,谢胡主席问得非常详细,周总理也不时提出问题,作些指示,并同社员交谈。参观效果很好,超过了我们预期的目的。谢胡主席表示:中国同志能在如此贫瘠的山地上造出良田,生产粮食,栽种果树,使外出逃荒要饭的人重返家园,过好日子。阿尔巴尼亚条件比这里好,我们向中国同志学习,也一定能生产出粮食来。他请周总理送他们一部介绍沙石峪情况的纪录片,以便回去号召并激励阿尔巴尼亚人民因地制宜开发山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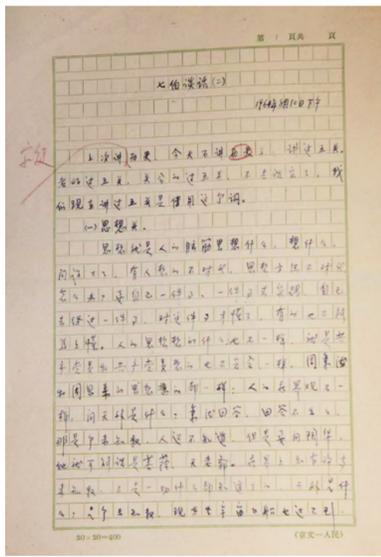
他是廉洁奉公的楷模

记得是1964年初秋,蜜桔收获季节,礼宾

司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礼宾司以周总理名义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桔。我们在办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感到以国务院总理头衔赠送不大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很快得到周总理办公室答复:总理同意我们的意见,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听了这话我愕然不知所措,脱口而说:“这要花周总理多少钱呀!”当时我们认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还是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都应由公家报销,因此没有考虑费用问题。蜜桔本身不贵,但运费可观!周总理的警卫秘书说,周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尽量省着些用吧!我又是一惊,我们出的主意给周总理添了麻烦了。我们的周总理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的总理,公与私的界限是那样的分明。我心里十分不平静,找了几个同志商量,既要按周总理的指示不花公家钱,又要千方百计节省周总理仅有的400元。人多主意多,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托人带。这样省却了昂贵的运费。事情办得相当顺利,王后接到礼物后非常感激。

周总理生活十分简朴,多少年来,周总理出国访问,按规定发给的服装补贴费,他从不领取。1966年6月,周总理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三国。考虑到他的衬衣大衣都已破损,我们几个人决定为他添置了两件衬衣。到了国外换洗时,总理发现新衬衣,当即查问是怎么来的,并批评不该这样做。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周总理一贯遵循的原则。1965年,我们一架专机送外宾到上海出境。在锦江饭店遇到了周总理的警卫秘书,交谈中得知上海军医大一位女同志要到北京看望邓大姐。我表示,明天我们是空机回京,她可以同我们一起走。晚上,俱乐部礼堂有晚会,周总理和工作人员都出席了,当我们来到礼堂时,偶然地听到周总理在批评一位年轻女同志,意思是说,她自己要去北京看邓大姐,就自己买票去,不要沾公家的便宜。我当即意识到,这是由我引起的。于是走上前去,向周总理解释,这是我的错,是我叫她明天一起走的。周总理犹豫了一下,对我说,原谅我这一次,但到了北京不要派车送她,让她自己乘公共汽车去。在机上和这位年轻同志聊天时,我说我们常有空机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她说,我可不敢再沾光



1964年8月10日,周恩来召开家庭会议,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图为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现场记录稿。

了,伯伯说了“下不为例”。这时我才知道她是周总理的侄女。

1966年6月,周总理到巴基斯坦访问时,巴方领导人给周总理送了一批芒果。使馆同志包装成了三箱。回国途中,周总理到新疆视察我国导弹基地。离开前,周总理嘱咐留下一箱芒果给长年在沙漠工作的同志们品尝。回到北京,其余的两箱分别送给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周总理对礼品的处理极其严格。我在礼宾司工作期间,接触到外国人给周总理送礼的数量是很大的,但从未见周总理派自己办公室的人或警卫人员到礼宾司取过礼品,总是要我们上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一张尘封合影背后的故事

邹平



1950年初秋,周恩来与淮安亲属在北京西花厅合影。后排左起:常策欧、刘淑媛、邓颖超、周恩来、周杨氏(八婶母)、王兰芳、周荣庆、沙明、郑崇实

新中国成立后,开国总理周恩来日理万机,但他从没有忘记曾为抚育他付出千辛万苦的二姨母。1950年初秋,周恩来的二姨母杨氏和其长子周尔辉被接到北京,留下了一张从未公开发表的珍贵合影。

周恩来为何在新中国成立初就急于将二姨母接到北京呢?这里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呢?

这源于他年幼时对八伯一家的真实感情。1907年夏天到1908年初,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嗣母陈氏先后去世。当时,周恩来的生父周劭纲在外谋生。10岁的周恩来带着周恩溥、周恩寿两个弟弟与八伯父一家相依为命。八伯父周贻奎得过小儿麻痹症,留下腿疾,不能经商或务工。在家庭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八姨母既要照顾丈夫周贻奎和自己的儿子,还要抚养周恩来三兄弟,六口人生活十分艰难。八姨母作为周恩来弟兄的实际监护人,吃尽千辛万苦,幼小懂事的周恩来看在眼里,感恩的种子一直埋藏在心里。

1918年1月8日,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得知八伯父周贻奎病逝的消息,在日记中连续7日记录下他对八伯父去世的感慨和悲痛。他在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连着这三天,夜

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想到这里,我现在唯有将这件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

1958年,淮安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汇报工作,周总理在接见他时,特地提到了自己的二姨母,深情地说出一个故事:“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们怕出事,把小船都锁起来,我们就悄悄地开锁划船,划船划远了,吓得家长们敲锣,满街满巷吆喝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划到河下,二姨母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的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少不了要挨惩罚!可二姨母半句也没责怪,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簌簌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

周总理长侄女周秉德回忆说:我们的二姨母那次到北京后,很不习惯那里的生活,她说别人听不懂,别人说话她也听不懂,所以她住了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回淮安老家,临走之

前就在西花厅拍了合影照片,先是伯伯亲三兄弟的家人和八奶奶一起拍的一张照片,等于是解放以后我们周家关系最亲密的人的一个合照了。

周秉德记得,也就在同时,还拍了另一张范围大一点的照片,增加了周总理南开中学的同学常策欧和另外几位周家亲戚。

据提供这张照片的民间周恩来资料收藏者称:照片右侧后排第二人只知姓沙,但不知其名。淮安周恩来文化研究会经多方寻查得知,沙姓男子叫沙明,淮安三堡乡沙滩村人(今淮安区漕运镇),就是他当年护送周总理八姨母杨氏及其长子周尔辉去北京的。

我们带上这张照片前往淮安沙明之子沙俊生先生住处进行了专访。谈及这张照片时,已91岁高龄的沙俊生老人一眼就指向站在后排位置的沙明说:“这就是我父亲,他曾叫沙宝钟,解放后改名为沙明,确实是我父亲将八姨母护送到北京的。父亲曾对我们说过,当时是从淮安运河码头乘船向南经扬州,然后从南京浦口坐火车去北京的。父亲和他们奶奶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又一起回淮安。”

当问及为何是您父亲护送周总理八姨母去北京的问题时,沙俊生老人回忆说:“当时周家在淮安除八奶奶以及她儿媳陶华和周尔辉、周尔萃两个孙子外,已没有直系亲属了,有能力的周家男子早都外出谋生了。八奶奶此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因我父亲与她老家的独子周恩硕是连襟关系,让我父亲护送八姨母去北京是比较合适的。可以这样讲,当时在淮安城内,与周家大院有亲戚关系并交往密切的就是我们家。因为周总理嫡亲三叔(家族排行称八伯父)周贻奎的独子周恩硕是我的四姨父,其妻陶华与我母亲陶英是亲姐妹,其长子周尔辉和次子周尔萃和我是姨兄弟。”

沙俊生老人接着说:“我外公家在林集乡,生有五个女儿,其中大姨母嫁到淮城,二姨母和三姨母很早就因病去世了,陶华是四姨母,我母亲陶英是老五。听四姨母说过,八奶奶曾两次被接到北京,周总理曾想让她在北京安度晚年,但八奶奶因信佛吃素食,又要每天烧香敬佛,生活不太方便,最后是自己坚持要回来的。八奶奶年近80岁时因病去世后,周总理特地写信给淮安的领导,不仅结清了八奶奶在县医院住院治疗的全部医药费,还提出弟媳陶华等人今后每月的生活费由他承担,地方政府不要再给予照顾。”

沙俊生说起自己知道的一些事:“解放前,我就住在城内司马巷的周家院内与我大一岁的姨哥哥周尔辉一起上小学。四姨父周恩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办公室

淮安县人民委员会负责同志:
尔萃兄弟,几年来你们对我伯母陶英关怀,尤其在生病、住院期间,为了她的健康、住院治疗,到你们那里看了不少病,今年你们表示愿意,把我伯母接回家,今后她的医药费用均由你们负担,请速回信到西花厅王副秘书。
周总理为尔萃伯母医药费用所欠欠款二十五元,请查收。
敬
周恩来
1957年4月19日

1957年4月19日周恩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的信

很喜欢我,尔萃弟弟最像他父亲,他经常带我们出去玩。二姨父当时先在县城做税务工作,然后去林集乡教书,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带口信让他不要为城内日伪政权做事,去参加新四军,在淮安林集乡一带就地开展抗日运动。1943年在乘船前往岔河途中遇害,年仅42岁。我当时只有10岁,八奶奶和四姨母到处寻找,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婆婆二人仅靠做针线活和微薄的房租生存,尽管如此,还要抚养尔辉和尔萃两个年幼孩子读书,困难情景难以想象。我们家在三堡农村有



1950年初秋,周恩来送别淮安亲属离京前在北京西花厅合影